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专辑】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实践

China's Opening-up: Strategy and Practi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张蕴岭/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专辑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实践

China's Opening-up: Strategy and Practi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张蕴岭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专辑）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实践

主 编 / 张蕴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许春山 何 倩

责任校对 / 尤田雄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343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411 - 0/D · 0165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实践/张蕴岭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专辑)

ISBN 978-7-5097-0411-0

I. 中... II. 张... III. 对外开放-研究-中国 IV. 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488 号

编者前言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壮举。1978 年中国面临着历史命运的抉择。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中国面对的是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困难，如果任其下去，只能进一步恶化。在此形势下，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改革就是对内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计划体制，开放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短短 30 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上，我国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五位，国际贸易位居世界第二，2008 年有望跃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小康。随着实力的增强，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大大提高，我国积极融入世界，参与国际事务，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作出了积极的、令人钦佩的贡献。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起飞，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中华民族正在为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梦想努力奋斗。

30 年来，我国通过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世界资源，弥补了我国经济现代化起飞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缺口，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 10%，对外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20%，吸引了近万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以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快的速度、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开放的体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腾飞。未来 30 年尽管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但仍然是我国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30年来,我国外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我国的外交就是紧紧围绕创建和平发展环境这个根本任务而努力的。一方面,我国抓住冷战后世界格局转换的时机,改善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增进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密切了与邻国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利用自己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提出自己的关于国际和地区关系的理念、主张和战略。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倡导新安全观,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这些都展示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们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和平发展环境,而且也有利于创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惠及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学者们以他们独有的智慧、热情和勇气,积极探究新问题,提出新对策。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他们站在观察和分析国际局势、我国对外开放与对外关系的前沿,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既包括理论探索,也包括政策对策,都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国际研究学部汇集了本学部学者近年来就我国外交、对外开放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的部分论文。论文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名誉学部委员、学部委员,也有成就不凡的中青年学者。在收录本专辑时,作者们对原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修改。在过去的30年里,国际研究学部的学者们发表了巨量的学术成果,本专辑出版的目的是旨在反映国际研究学部过去的学术成果,而是为了纪念我国对外开放30周年。因此,本专辑只收录了部分涉及我国对外开放(外交、开放政策、对外关系)问题的论文。

主编根据本专辑的结构和内容要求,对遴选的论文进行了最后的取舍和必要的编辑。论文的遴选得到国际学部各杂志编辑部的大力支持,谭秀英、宋志刚、常玢、徐拓、蔡同昌、林昶、赵梅等编辑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国际研究学部办公室的李墨女士为本专辑的联络、编务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本专辑的及时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蕴岭

2008年7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00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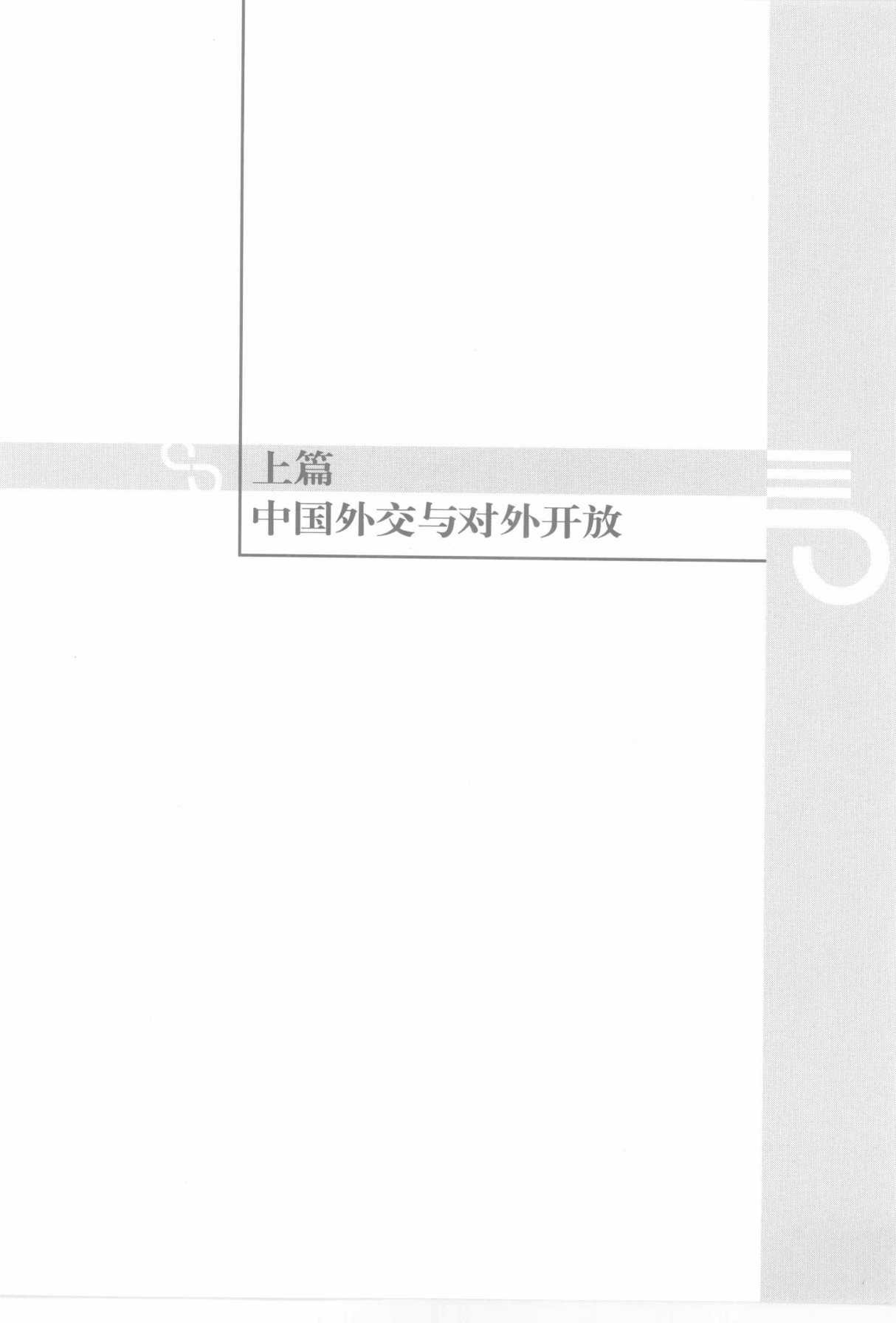
上篇 中国外交与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特色	王逸舟 / 003
中国的大战略与地区战略构造	唐世平 / 027
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	张蕴岭 / 039
论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	陆建人 / 053
中国双顺差的性质与解决办法	余永定 覃东海 / 067
中国的对外贸易与进口战略	姚枝仲 / 085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张宇燕 管清友 / 097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外来援助	周 弘 张 浚 张 敏 / 131
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应对	陈 迎 / 148

下篇 中国对外关系

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资中筠 / 169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李静杰 / 187
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与中日关系	冯昭奎 / 210

中国对印度关系的战略定位	蓝建学 / 228
中国与东盟相互依赖关系的战略塑造	王玉主 / 246
构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新型关系	孙壮志 / 259
加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思考	贺文萍 / 275
从能源联系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	杨 光 / 289
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	江时学 / 300



上篇

中国外交与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特色

王逸舟*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可谓成果颇丰，在内政领域摸索出一个极具特色、效果显著的中国模式，在外交领域则造就出一系列有独特性、创造性的做法和理念。

一 相辅相成的三大保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第一，全力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民生活的改善。这中间既要努力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要学会在新的市场化环境下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互利共赢的往来，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国内转型，也适应与外部关系的不断调整。第二，在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和广阔海洋国土以及历史上和现实中同十余个国家存在各种各样主权争议的情况下，努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为世界繁荣与稳定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在自身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民的国际意识不断增强的前提下，适时增加对地区和全球事务的介入程度和贡献力度，使中国的成长和中国人的自觉努力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在新时期进步与发展的源泉之一。

概而观之，“发展”、“主权”、“责任”三个范畴各有侧重、互有制约，构成

*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之相辅相成、动态均衡的“三大目标”，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各种外交倡议、行动及动员过程的三种来源。这些年来，中国外交始终围绕“三大目标”展开服务和保障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们之间持续着的复杂互动和平衡关系，既是复杂的外交决策处理的对象，也是国内外研究者有兴趣观察的内容。

公众和社会对于外交政策的期待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目标的排列组合、目标次序的确定以及资源的相应配置，都事关重大政治决策。由于各国情况不一样，目标的排列也不会一样；大国和小国的目标不会相同，大国之间也有重要差异。^①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自己的外交目标，而且这些目标的多样性是很多大国不可比拟的。从实际结果看，在邓小平理论的引航下，中国外交政策目标与从前相比，在大国关系上显得有取有舍，重点突出，目标明确；曾经兴盛的“世界革命”目标逐渐退隐，而“三大目标”已经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的优先关照对象；“自身发展”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便处于重心位置，始终占据着某种主导地位；“维护主权”从来没有被忽略，但在不同时期的优先次序却有所调整；“国际责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却受到高度重视。聚焦“三大目标”，既有得也有失。但从效果看，利远大于弊，得远多于失。

长期存在的“三大目标”复合体，既是中国外交思想的特色，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难点。需要研讨之处在于：从长远看，它们相互促进，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相互制约，处理好三者关系有很多难处。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确定的最大目标是“发展”，外交工作确实把保障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但从不同的人（如军事家和外交官）、在不同时期（如在平常时期与中日海洋权益纷争或台湾问题凸显的阶段）、从不同领域的利害关系考虑，主权目标和发展目标之间并不存在何者绝对优先的问题；加上近些年来，内有日益增强的责任感，外有国际社会要求中国

① 英国新近出版的一本外交政策著作提到，大国外交通常有七个方面的目标：（1）保护海外公民；（2）塑造海外身份；（3）维持稳定，或是防御外部威胁，维护领土完整和社会和谐；（4）促进繁荣；（5）就海外干预作出决定；（6）达成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7）保护全球公共事务。该书作者的母国（英国）及其外交传统显然是其内心深处考虑大国外交时的范本之一。参见〔英〕克里斯托弗·希尔著《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陈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46~47页。

承担更多责任的压力，责任目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外交保障目标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进一步增强，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把握这些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更加困难。因此，我们现在应做的一项研究工作是：通过经验分析和比较外交分析，^① 鉴别出我们外交目标的某些不足（如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仍偏少，主权纠纷解决方案的前瞻性探索不够，发展目标在新时期内涵的调整方向有待明确），摸索三大目标在不同条件下的均衡点，勾勒出中长时段的动态均衡曲线，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二 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

在外交风格上，中国这30年来的外交一直信守邓小平所要求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在国际事务中奉行不对抗、不结盟、不扛旗的立场，在综合国力和外部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始终保持低调、冷静、平和的处事态度，与某些大国的霸权主义或强势作为（如美国的强硬单边主义和俄罗斯的咄咄逼人政策）形成明显反差，也与此前30年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外交形象有明显的区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中国在长期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时，尤其是在“台独”势力嚣张可能导致军事对抗的情况下，不但对外一直保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温和形象，而且对内有效地遏止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韬晦”方略的成功推进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外交工作者心血的结晶，也是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拾优秀历史传统的一个贡献。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和平崛起、实力日增的背景下，针对如何定义和更好地实现“有所作为”的问题，中国内部存在着各种争论和不同主张，甚至出现了放弃“韬光养晦”战略的声音。对于外交决策者和研究部门而言，如何根据新情况界定“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内涵，以在整个“战略机遇期”（未来15~20年）保持温和的进取姿态，将是一个巨大的新挑战。因为“韬光养晦”在国内外战略学界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中存在着大相径庭的

^① 可参见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影印版, 尤其是第二部分“Patter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23 - 147.

解读：有人认为它表达了中国不称霸、不对抗的意愿，有人觉得它不过是中国不够强大时的暂时忍让。而“有所作为”的界定更是见仁见智：何处、何时、怎样作为，在学界与操作层之间和内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与取向。另外一个问题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种微言大义式的政治表述，并不能代替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和外交学界人士对于短期、中期、长期战略的精致规划与系统说明。但是如果缺乏对国家利益和总体目标的深刻了解，再精巧低调的外交手法也难以持久。那么，什么是新时期的国家利益？总体目标的内在逻辑与层次如何划分？策略与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怎样保持？中国目前所奉行的不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抗的原则，或者中国在与邻国的主权纷争中所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立场，究竟是自身实力不够所致，还是新的世界观和政治哲学观使然，抑或是受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政治文化对于“韬晦”方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一个社会在政治方面普遍、长期和基本的实践与态度，这些东西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哪怕暂时受到抑制而没有表现出来）。^① 它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一是民族的历史经验，也就是塑造一个国家与公民的所有事件与态度的总和。比如，美国历史上很少遭遇入侵，而中国多次遭受外敌入侵，这种差异必然导致美国人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大相径庭。美国人很难理解为何中国人容易产生被包围的感觉，也不太理解为何中国人对于主权如此珍视。中国一向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相关权益上，而美国所具有的移民大国的特质，导致其滋生出“世界警察”的心理素质。其二是民族的信仰体系，也就是民众持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伊朗的什叶派教义、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俄罗斯的强国自豪感乃至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天下观和朝贡思想，^② 这些倾向在各国看待自己和决定对外政策时都发挥着这样或那样、公开或潜在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家和军队将领不大可能像普京那样“秀肌肉”、赞美军队的国际进逼行动。恰恰相反，中国即便在不得不反击的时候也多半是多做

① 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

② [美] 约翰·罗尔克编著《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宋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08～113页。

少说或只做不说。中国人看重国家间的理解和相互尊重,也比较有耐心;而美国人重实利,说话办事风格非常直白。^①当然,不同风格各有利弊。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肯定和坚持“韬光养晦”谋略的同时,不可忽视它潜在的消极面。广义上,所谓“战略文化”和“外交文化”范畴相同,它们亦有类似“政治文化”的含义及作用,但这些概念还有赖于中国的研究人员结合外交实践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②

三 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

新时期中国外交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方面,既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那种激进的革命造反观,也绝非没有原则地依从现有体制和西方大国;它所采取的立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精心选择。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经过江泽民时期直至今天的胡锦涛时期,几代领导人主导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国际秩序观,坚持了保持既有原则又温和克制的改造方针。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过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他多次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和干涉企图,但同时又非常重视并大力推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全面深化与发展,视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时期的中国外交,坚持了邓小平不搞对抗的方针,同时大力倡导国际新安全观和全球政治多极化理念。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之间多次发生严重危

-
- ① 一位美国外交研究者认为:“非西方人认为美国风格过于坦率,缺乏耐心,不敏感,喜欢掌握主动,喜欢视问题为危机等等。美国人则认为非西方风格对于形式重视过多,对原则的重视超过对问题本身的重视,谈判中采取不合作态度以及未达成协议就结束会议等”;“对文化的相互忽略会影响到协议的达成,而对文化的相互了解和欣赏则有助于谈判的成功。”这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导致的问题。转引自〔美〕康威·汉得森著《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金帆译,海南出版社,2004,第204页。
- ② 国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对于中国特有战略文化的讨论,比较注重从中国古代兵书和战争文献里挖掘素材,但他们从自己的思维方式出发,对于类似“中国战略文化到底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问题始终困惑不解。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在这里,“战略文化”范畴更多的是从军事安全和军事外交的角度设定的。广义地讲,“外交文化”则包括了从一个国家的外交传统、外交习俗、外交方式到人们对于外交制度设置的看法、外交官身份的具体要求在内的所有观念和意识,它虽然更多地体现在“外交圈”里,但实际上却延伸和内化至更大,也更难界定的范围。

机（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2年的中美撞机事件等），中日政治关系也由于各种原因起伏不定，但中国外交并没有因为同西方主要大国的麻烦而陷入自闭和僵硬状态，相反，却开展了多种多样、有声有色的活动（包括倡议），加强了与俄罗斯和德、法等西欧大国的战略协作关系，在保障中国自身继续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的进程。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在指导中国外交工作中，更加注重全方位和均衡的方针，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这些战略方针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成长，也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再思考、再塑造和再推动。

不难发现，中国外交的国际改造观主要有以下内涵：首先，它坚持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在主流与支流、大局与局部、和平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诸多难题及挑战之间保持辩证认识，这为中国主要运用和平的外交方式反对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的做法提供了依据。其次，它强调依照事件本身来判断国际关系的是非曲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坚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再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具有三大特征：突出和平、重视合作、追求共赢。它显然有别于历史上那种扩张式的崛起方式，是一种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方式。最后，它特别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这些逐渐清晰的内涵，已经被当代中国外交官内化，成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时直面困难和挑战的基本指导方针。这种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基础，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其他大国的某些重要分野。

辩证地讲，中国外交的这一重要特点也带来新的挑战 and 理论难题，需要深入研讨和不断充实。例如，当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国际场合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时，有不少国家和外界人士认为，这是“中国要求重新分割国际权力”的另一种说法，是新近崛起的强大国家对传统格局不满而发出的挑战。尽管同样的话可以用于俄罗斯、印度等国身上，但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使得中国承受的质疑要比任何其他新兴大国强烈得多，因而其对中国外交的潜在阻力也非同寻常。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并没有随着冷战格局的终结而消失，反而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而日益加剧。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理念，对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不同期待，对南北关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根源的不同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人类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演化方向，同时制约着不同国家的兴衰与成败。中国希望在现有国际体系内保持发展中国家大国的特性，发挥独特而有效的作用，使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理解、接受乃至欢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继而把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理念和国际秩序改造观看成是他们自己目标的一部分。实在地说，这决非易事。而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概念，外人可能会问：它到底具有什么含义？体现在联合国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解决地区热点冲突、防止核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领域，“民主”如何实现？有什么建议？中国怎样表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又有什么联系？二者是相互推动还是相互制约？是同步推进还是先后推进？相似之处和相异之处有哪些？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外交理论研究与与时俱进。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大国提出国际秩序理念和改造观的不少，但真正做到的不多，而失败或受挫的事例却不少。提出这类理念是非常严肃重大的事情，绝非仅仅为了对外宣传，而是在倡导特定阶段的国际纲领，因而对于外交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从这样的高度看，中国外交理论工作还有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 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

任何大国，除了中央（或联邦）一级的外交之外，都有其非中央的或次区域形态的对外交往形式，有相对独立的内容，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外交”（侧重点在于美国面向太平洋的交往），德国的“巴伐利亚外交”（历史传统赋予该州税收、警务、政党及对外交往的特殊地位），俄罗斯内部的所谓“边疆外交”、“近邻外交”、“远东外交”等。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大国，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各地区便有很强的自治传统和对外交往方式，这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尤其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布局和外交部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至更下层的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特点